

先秦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先秦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8月·天津

先秦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著

*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5印张 462,3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书号11301·8 定价4.20元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叫《先秦政治思想史》。书写出来了，可是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范围问题，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对象都说不太清楚，却要写一本书，岂不是太冒失了吗？我承认，确实有点冒失。但是事情常常是这样，并不是我独有的。你看，中国哲学史已写出了那么多部书，可是，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至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何况中国政治思想史尚处于拓荒时代，弄不清楚研究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尽管缺乏明确的认识，但又有无可争辩的理由证明它可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象在航海中遥望灯塔一样，对灯塔的本身结构虽看不清楚，可是所指的方向却是清楚的。我写这部书就是在既清楚，又模糊中向前蠕动。基于这种情况，我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网罗法，尽可能多地把有关的问题列入本书的内容，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二是排除法，凡遇具有综合性质的问题，比如名实问题，它兼有认识论、逻辑、政治等多方面的内容，本书就把专属认识论和逻辑

辑的问题排除，保留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论是网罗法，还是排除法，本意是想多收纳一些问题。当写完本书，回头检阅全稿时发现，结果与最初的主观设想正相反，内容不是失之于宽，而是失之于狭。

我自己模糊不清，决不是说学界都如此。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苏联学者有过清晰的概括：“政治学说史作为一门学科，要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地积累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派别的斗争中进行的。”（K·A·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导论》）中国学者也有相近的看法，他们说：“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又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述的说法，我认为是相当深刻的，作为政治思想主要内容之一是被抓住了，对我启迪甚多，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时时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感到上述的概括尚有不足的地方，问题主要是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的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根据我的粗浅认识，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还有如下一些内容也应列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首先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关于政治哲学问题。就中国先秦的政治思想理论看,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浑然为一体。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所谓精华并不是说它深奥或高雅,而是说哲学的认识是深刻的,具有普遍性。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各个流派和不同人物,其间的认识有深浅、精粗之分,这种认识上差别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哲理化的程度。缺乏哲理的政治思想,一般地说,属于直观性的认识。先秦诸子中的多数,为了充分和深入论述他们的政治思想,特别注意哲理性的认识。就目前的认识水平,究竟把那些命题视为政治哲学,或怎样才能更清楚地抽出政治哲学性命题,这是一个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从先秦政治思想史看,至少如下一些问题,都可以视为政治哲学,如天人关系;人性论;中庸、中和思想;势不两立说;物极必反说;理、必、然、数、道等等必然性理论;历史观;圣贤观等等。这些问题与政治思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问题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许多思想家把这些问题与政治理论、政策等交融在一起。例如,孟子的仁政理论就以人性善说为基础;荀子的礼治主张是针对人性恶而来的;法家主张人性好利,他们认为这种本性既改不了,也无需改,改了反而有害于政治。从这种理论出发,法家认为在政治上应该实行利用、利诱、利导、利惩等政策,超脱利害之民是不牧之民,应加以铲除。荀子对天的看法也很不相同,有的认为是神,有的认为是自然,有的认为兼而有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天制约着人事。由此出发,除神权政治外,法自然的政治思想在许多派别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细加分析,在法自然上又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天人契

合，有的主张天人相分，有的主张有合有分，有的主张天而不人，即绝对的自然主义。于是在政治思想上就形成了明显的分歧。从先秦政治思想史看，政治哲学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应该花大气力研究的课题之一。

其次，关于社会模式的理论（又可称之为理想国的理论），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模式思想与关于国家政权的思想，虽有密切的关系，但范围不同，两者不是一回事。社会模式或理想国理论是关于社会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理论或设计，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史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就先秦情况看，这一类的论述是相当丰富的，许多有关的设计和别开生面，耐人寻味。孔子的“有道”之世的模式，老子关于“小国寡民”的设想，庄子的“至德之世”、“无何有之乡”的幻境，孟子的王道世界，《礼运》篇中的“大同”境界，荀子的“王制”社会，农家人人劳动、自食其力、不分君臣的美境，杨朱童子牧羊式的田园生活等等，都属于理想国范围内的课题。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中，有异想天开的幻想，有对现实生活深刻观察后的升华，还有切近实际的描绘。如借用文艺词汇来表达，有的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有的则属批判现实主义的，有的可叫作浪漫主义，有的则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在这些理论中，有奇想，更有深刻的思考和哲学的思辨。就庄子的“至德之世”、“无何有之乡”而言，乍然看去，除了作者在那里一本正经、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理想世界之外，使人感到的只有荒唐。你看，他们要求人类彻底回到大自然中去，人们的社会性生活，不仅包括国家、政治、还包括一切知识文明，以及仁义道德等等，不仅是多

余的,而且都是祸害,应加以灭除。人类应该象牛马在草原自由漫步那样,过着“天放”的生活。对这种荒唐的追求,似乎可以一笑了之。其实,在作者到达这个荒唐的结论之前,还有深刻的思想作为先导,这就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及其矛盾问题。作者深刻地揭露了在当历史条件下两者的对立,可惜没有看到两者历史的统一;而对于其间的对立,又缺乏一副科学的头脑去对待。于是走向极端,用人的自然性去否定和排斥人的社会性,进而推导出纯自然化的无何有之乡的幻境,从而也走到了绝境;作者怒斥了当时社会关系对人们生存权利的剥夺,可是他们又让自然剥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权利;他们谴责当时社会关系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呼唤还人以自由,可是他们所向往的自由只不过是牛马自然生活式的自由,结果用自然的自由取消了社会性的自由和人的创造自由,人类反而失去了一切自由,人不再是人!在庄子的理想国理论中,到处是一片荒漠,可是在荒漠中又蕴藏着黄金。对先秦诸子各式各样的理想国理论,我们不仅需要进行描述,更需要进行分析,沿着他们走过的思路寻找他们的得失,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研究和分析社会模式思想和理论,应该是政治思想史重要内容之一。

再次,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国家和法与治国方略和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又有区别。我们从先秦政治思想中不难发现,一些人在国家组织体系和法律规定上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分,但在治国方略和具体政策上却有明显的不同,甚至形成水火之势。比如在农商关系上,有的主张重农抑商,有的主张唯农除商,有的主张农工商协调发展,有的主张以

商治国。凡此等等，在政策上分歧甚多，各有一套理论。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并且具有多层次性。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与政治实践有远近之分，有关治国方略和具体政策方面的主张与实际政治最为接近。实际的政治家常常从这些主张中选择行动方案。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应特别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还应把伦理道德问题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从学科上划分，伦理道德应该是另一个独立的领域。伦理道德不同于政治思想，比如在法家那里，他们便把政治和道德分为两种不同的事情。不过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些派别把伦理道德政治化，这一点在儒家那里表现的十分突出。比如“孝”，早在周初，周公就明确地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规定，在《康诰》中宣布：“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对不孝不友者“刑兹无赦。”春秋时期晋羊舌大夫说：“违命不孝。”（《左传》二年）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孔子把孝视为直接的政治。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当官从政？孔子回答道：我宣扬孝道，就是从政。（参《论语·为政》）儒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为一，也就是把道德与政治合而为一。把道德政治化，以道德治国虽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但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占正统地位，因此伦理政治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着深远影响，应给以足够的重视。

关于政治实施理论以及政治权术理论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容。进行政治决策以及如何把政策、政治规定和各种行政措施付诸实现，这是政治思想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比如关于进谏、纳谏、庭议、兼听、独断、考课、监察等等，都属于这中间的

问题。

在君臣关系方面，人们喜欢讲忠义，其实内中充满了利害之争和尔诈我虞。这一点被法家彻底揭露出来了。权术的种种论述，就是官场争斗的理论表现。比如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臣子如何进说就是一个经常被人议论的课题。韩非子的《说难》是专论这个问题的名篇，人所共知。其实，他的论说脱胎于他的老师荀子。荀子在《非相》中有一段论述，应该说是《说难》的张本。在先秦诸子中有，关政治实施和政治权术理论是相当发展的，具有独特的意义，很值得研究。

以上开列的几项远没有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说完全，但这几项大抵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我们能否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一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想勉强为之也不是不可能，但又思及我的这本拙作仅只是一个断代的探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全过程尚乏研究，因此，概括研究对象自感功底不足；再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现状而言，目前尚处开拓阶段，特别是对研究内容的开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认为，只有把研究内容弄得比较清楚了，才好对研究对象进行概括。有鉴于此，本书有关研究对象的概括和规定便只好暂付阙如，免得作茧自缚，妨碍内容的开发。

二

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当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为了加快研究的步伐，一方面要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还要借鉴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根据个人

粗浅的体会和观察，我认为应该像广角镜那样，从多方面着眼，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开展研究。

首先需要进行的是按思想家或代表作进行列传式的研究。思想史不同于其他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思想家的个人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每个思想家虽然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一定的思想又是思想家个人认识的产儿。因此，一定的思想，一方面不可能不以产生它的历史条件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个性。在古代，由集体智慧而凝结为统一认识的成果虽不乏其例，但主要的是个人的认识。因此，列传式的研究，是研究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在内）的基本方式之一。甚至可以这样说，列传式的研究是基础性的研究。对思想家和代表作研究不够，也就难于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以列传式研究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已有好多部，正是这些著作使哲学史的研究获得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为了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础打的宽广深厚，恐怕也需要几部或十几部不同风格的以思想家为基础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断代史和专人史。

其次，进行流派研究。在政治思想领域存在着流派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不会有疑义。但是划分流派的标准却是一个尚待深入讨论的问题。就目前的认识来看，有的以阶级为标准，比如奴隶主的政治思想，封建地主的政治思想，农民的政治思想等；有的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为准，如划分为先进、落后、改革、保守等；有的以思想理论特征为准，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平均主义思想等；有的采用传统的说法，如儒、法、道、墨等。这些标准，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不过在实际的运用中又常常遇

到困难，捉襟见肘。不管用什么标准去划分，都说明流派是存在的。从思想史看，只有形成流派的思想，才能把认识推向深入，才能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流派对历史的影响比之个人要大的多。在历史上，某些思想领袖之所以显得格外突出，也是以流派为基础的，因此研究流派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要开展社会思潮和一个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以个人和流派为限，而是以每个时代普遍关心的热门问题为中心进行综合研究。比如战国时期，不管是那家那派，都对人性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因此人性与政治关系就可视为一个思潮问题，有必要进行综合研究。又如，先秦诸子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出发，广泛讨论了君主的产生、品质、作用、品分等等，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因此君主问题作为一个思潮问题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通过思潮和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既可以对一个时代普遍关心的问题作出总的估计，又可以看到，一个一个人的认识如何汇成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象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巨流那样，汇成一种历史文化流，即普遍意识。比如先秦诸子对进谏与纳谏问题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和态度，分歧颇多。但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即进谏与纳谏是政治上的美德和政治兴旺的必要条件。这种共同的对实际政治曾起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关于政治思想史中的思潮和重大课题的研究，应该给予特别的注重。

还有，关于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范畴，例如礼、德、法、刑、仁、义、爱、赏、罚、势、术等等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每个学科和学派都有它们特殊的概念和范畴，从而形成特定的思想形式。概念和范畴虽然不是独立的存在，但一经出现，又有相对的

独立性，并在认识中作为纽带把前代和后代联系起来。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每个人认识上的差别，所用的概念字面上虽然无别，但所表达的客观含义常常有很大的差异，在各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很不同。因此对概念与范畴作总合的研究是剖析普遍的思想形式所不可缺少的。比如“仁”这个概念，差不多先秦诸子都使用，在政治和道德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仁在各家那里却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是对立的。儒家高举仁的旗帜，出公入私，招摇于世。可是庄子对仁却给以鞭鞑，《天运》说：“虎狼，仁也。”细加分析，在儒家那里，仁的地位也不相同，孟子把仁作为最高的旗帜，荀子则更看重礼，仁从属于礼。研究重要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变化，对推进政治思想史认识是极有意义的。

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十分重要。人所共知，只有比较才能进行鉴别，评价得失，权衡利弊。比较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如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不同流派比较，流派内部不同代表人物比较，不同时代的比较，中外比较等等。比较研究能够开阔人视野，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和估价各种思潮。

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也应该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后者属于政治史。但两者又有权为密切的关系。政治实践是政治思想认识的对象和产生的主要土壤之一，反过来，政治思想对政治实践又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乃至起指导作用。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有些政治家把某一种政治思想奉为主臬，有的则兼蓄并用，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难于从一家一派直接说明对政治实践的作用，而只能从各种政治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总体来考察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在研究政治思想时，我认为，价值性认识和非判断性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还要考察它的价值。为了判定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要明确价值标准。对我们来说，价值标准是明确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经验告诉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却又表现为千差万别。比如，同是一个孔子，有的认为他是反动派，有的认为是革命党。在两种极端认识中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余地，于是许多人在这个中间地带又找到了各式各样的价值标准。价值问题不只是个阶级定性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政治思想史不作价值分析，政治思想史就会变成一笔糊涂帐。为了更好地判明各种思想的价值，应该探讨一些价值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借助历史学中已获得的成果，又要结合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情况，理出一些自身特有的标准。

是非判断性的认识与价值性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但又不相同。在政治思想史中如何判断是非，即判明真理与谬误，实在是一桩更为困难的事。从哲学上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人所共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把这条原则用于政治思想史，就产生了许多节枝。政治中的实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古代，除了某些短暂的革命时期以外，当权的都是剥削阶级。人民群众的许多美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也实行不了；反之，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却付诸实践，而且证明有许多主张在当时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进历史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谬误该如何分辨，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中有否科学和真理？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起了积极作用的思想是否就是实践检验

证明了真理？人民美好的，但不能付诸实践的政治愿望，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凡此种种，是急须讨论的问题，我一时还说不清楚。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把哲学史中判断是非的方法简单地拿过来运用于政治思想史，是难于说清问题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同志作些新的探索。

以上所说，带有面面观的性质，而且又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面面观总不免要流于片面。如果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感到满足了。

本书基本上是按列传式的方式来叙述的。战国时期的思想看起来是讲流派，实际上仍然以列传式为基础。以上所讲的各种不同方式的认识，虽然我力图在列传式的叙述加以贯彻，但更多的是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里写出来为的是求教。

三

政治思想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要讲利害，因此，指明每个思想家和流派的阶级性，是写政治思想史首先应该注意的。对这样一个应该细致从事分析的事情，我却采取了大而化之的办法。对此应向读者作一下交待。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而且研究的重点是先秦。就实而论，对每个思想家或流派的政治归宿，各自代表那个阶级或那个阶层或集团，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看法或选择。可是在具体论述每个思想家的政治倾向时，我写的都比较含蓄，许多地方采取了模糊的认识方式来表达，只是指出了政治上的基本倾向，或从总体上说明一下

代表那个阶级或阶层。我之所以采取模糊的方式来表述，有如下两个原因：其一，迄今为止，关于先秦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分歧甚多，不同见解不下六、七种之多。多种认识的并存，一方面说明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总体认识尚处于不确定阶段；其二，对先秦的阶级、阶层、集团、各种人社会身份的研究还远未深入，有些甚至尚未认真触及。以上两个问题对确定政治思想的社会意义和每个思想家的阶级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两个重大问题还不甚清晰的情况下，结合我个人的实际，与其把事情说的十分具体，还不如采取素描的方式更为适宜。我决不是不想把阶级分析具体化，但就目前我的认识水平而言，强把问题说得具体是困难的，而且对我自己今后进一步认识又是一个包袱。有的同志可能会提出，你既然还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为什么要出书呢？这个问题，我也曾不断向自己提出，并且还请教过一些同志。我是这样想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尤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目前还处于襁褓之中，有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想把缺陷隐蔽起来，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一方面向读者表明，我的认识目前只到这一步；另一方面，是为了求得同志们的帮助。

*

*

*

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再认识的过程，因此这本书只是我终稿时的认识，它不仅在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将继续探索。

刘泽华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商代的政治思想	(1)
一、商代的社会概况	(1)
二、上帝和祖先崇拜与神权政治	(6)
三、“余一人”和王权专制思想	(16)
四、几个政治概念的出现	(20)
五、结语	(23)
第二章 西周时期的政治思想	(24)
第一节 西周的社会概况	(24)
第二节 周公尊天崇祖，敬德保民思想	(29)
(一) 周公旦辅政	(29)
(二) 敬天思想和对殷代上帝观念的修正	(30)
(三) 尊祖敬宗	(35)
(四) 明德慎罚思想	(37)
(五) 保民	(40)
(六) 建业与守业	(41)
(七) 结语	(42)
第三节 西周中后期的政治思想	(43)